



Harvard-Yenching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 著 陆洋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国个体化社会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 著 陆洋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阎云翔著;陆洋等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书名原文: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BN 978-7-5327-5605-6

I. ①中… II. ①阎…②陆… III. ①个人社会学—

中国—文集 IV. ①C9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246号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opyright© 2009 by Yunxiang Ya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著 陆洋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5605-6/C·046

定价: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Harvard—Fuda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主 编 张乐天 潘天舒

顾 问 Arthur Kleinman (凯博文) James Watson (华 琛)

Rubie Watson (华如璧) Theodore Bestor (贝斯特)

总序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间的“桥梁”。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间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相信,包括华琛(James Watson)、华如璧(Rubie Watson)、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及本人在内的哈佛人类学家,在比较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田野实践

和理论探索,将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貌。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熟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这套书,还展示了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以及行政机构的田野考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将展示人类学方法在精神医学领域,包括像政治性创伤、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等方面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齐心协力,能在中国创造出全新的人类学领域,同时,鼓舞中国的同仁们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探索和发现,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成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Arthur Kleinman(凯博文)

2007年10月24日

献给张光直教授(1931-2001)——授业恩师,人生楷模

序言

凯博文(哈佛大学)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人类学名著,而这个村庄曾经是他在疯狂的“文革”期间生活过并在十多年后又重新返回做研究的地方。随后,他出版了另一部著作,考察在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情感、关系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通过探究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更广泛的亲属联系、家庭经济、婚姻、青年文化、女性地位、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众多领域的变迁,这本论文集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新塑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阎云翔断言这一变革已经在下岬村的居民中发生(阎与这些村民朝夕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通常做民族志所需要逗留的一两年的时间),并主张该村的新社会现实是普遍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同一变革的缩影。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生活中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同时这些新价

价值观也在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形成一场重构运动并反过来撼动和迫使外在的社会世界向某种新的方向发展。父权制虽然没有彻底让位,但已渐渐被淡化;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敬重已丧失了优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新的夫妻关系与年轻人文化的倚重;计划经济体制所确立的社会身份等级正在被一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创造的新等级制度所取代;社会不平等正在被再造与深化。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云翔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发展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这种新的个体主义趋向和自我塑造的潮流最先带来了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实践,带来了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从而将长久以来一直建立在文化道德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会导致腐败的互相利用模式。新个体主义也带来了关于美好生活和什么是善的新理解。当然,中国社会一向都有留给个体的位置;但是,在过去,人们很难公开地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体的位置,因为它在文化表达上更趋向于社会中心主义。所以,阎云翔向我们展示,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层次梳理,这三者的完美结合令人钦佩。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确实,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

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这本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 and 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197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做调研。在此之前的10年中，我已经与家人一起在中国台湾地区生活和工作了3年，那段时间的经历对我影响深远。1978年的中国留给我的印象难以忘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苦果、摆脱“极左”政治的努力、新出现的商业行为的合法性。最为深刻的印象还是人们的兴奋与机遇——虽然人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是那样严峻、毫无生气，在过去的30年中与世隔绝并且仍处在穷困之中，但是他们正小心翼翼地音乐、艺术、穿着、饮食、人际关系和社会体制上进行着新的探索。在此后的30年里，我到中国进行了难以数计的研究访问和私人旅行，每一次都让我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步伐和建设程度感到惊讶。通过研究访谈和与中国朋友的来往，我能感觉到人们自己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我还不能完全领会，如果既不用过分简单的普遍性概括也不用自相矛盾但却符合多元化印象的并置比较法，我们该如何记录和阐释这纷繁复杂的变迁漩涡。似乎没有任何理论框架能够解释我所看到和经历过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嘈杂交杂的”的混乱，即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之为真实的现实。发生在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国家，再加上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的差异，这种令人目眩的复杂多元的真实现实似乎根本无法用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所以,我起初怀疑阎云翔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内部含有一条提供逻辑一致性和分析精确性的金线。他描绘了社会生活在下岬村和其他地方是如何变迁的图景。正是这个图景中详细的民族志资料使我确信他找到了仍在形成之中的新现实的一个关键方面:一种中国式的个体主义的浮现把全球进程与地方实践结合在一起。几十年前,台湾地区的两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杨国枢和黄光国提出,虽然社会关系网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核心,但是每一个关系网却以个体为中心。因此,哪怕在一个以集体关系为特色的社会中,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主张推动了社会理论的中国化运动。阎的工作所论证的是,个人的中心位置已经强化,在集体进程下个人实践的新合法性已经孕育出对自我利益的公开表达,而以前只有通过家庭主义或集体主义语言表达才能在文化上被接受。阎具有人类学家的天赋,能够通过对于一个情景接着一个情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的生动描述来阐明这个观点。

当然,描述一个村庄的地方性现实是一回事,推及到整个中国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阎的阐释如此具有说服力、他的分析框架如此条理分明(再加上他对中国其他农村和城市地区现实的对比分析),以至于熟悉今日中国的读者将会发现自己也可以提出额外的案例证明这个观点,即新的自我存在方式正在当代中国新的道德语境下浮现出来。

我们不应该指望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去界定这一个体化过程的层次和具体领域。这将是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精神病学

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任务。不过,阎在以下各章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足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引向关于中国人生活体验的一系列新课题;我相信这些新课题将改变中国研究领域,同时激励在人类学和亚洲研究中已经萎缩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或者,非自由主义的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这样,个体化就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在过去,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一直主导着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阎的贡献是正在成长中的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人类学认为更加重要的发展——虽然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基础上——正在以社会生活的方式进行着。理解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长期指南,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正在建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蓝图。我们必须记住,这座新的文化大厦的非同一般的基础也包含了新的做人方式、新的道德生活和对未来的新期待。

(陆洋译)

目录

序言(凯博文)	1
导论:个体的崛起	1
第一章 农村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分层的影响	33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57
第三章 夫妻生活的胜利:家庭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90
第四章 实践性亲属关系	125
第五章 农村的青年与青年文化	150
第六章 青年女性的崛起与父权的衰落	177
第七章 个体能动性 with 彩礼的演变	201
第八章 如何做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	234
第九章 社会转型期的消费主义	258
第十章 麦当劳餐厅里的社会空间	294
结论:社会的个体化	326
附录:中国的个体化之路	351
英文版原始出版者名单	383
致谢	385
中文版致谢	386

导论:个体的崛起

本书所汇集的论文记录并考察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两个方面,即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在“导论”中,我将重点讨论个体的崛起,并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为本书各章提供一些更新材料和评论。社会的个体化和中国案例的理论含义将在“结论”一章中得到深入讨论。

改革时代的回顾

无论本书各章最初的出版日期是何时,它们实际上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产物。十章中有八章成稿于 90 年代。虽然其中几章含有我在新世纪田野工作的新素材,但它们主要都取材于 1989 到 1999 年田野调查的资料。本书的前八章聚焦中国东北下岬村的个体村民的能动性和社会行动。从 1971 到 1978 年,我曾经作为一个农民在下岬村生活与工作过 7 年;之后我又分别在 1989、1991、1993、1994、1997、1998、1999、2004、2006 年和 2008 年重返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关于该村的详细描述,参见 Yan 1996: 22-42, and Yan 2003:17-41)。第九和第十章探讨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以我在北京的田野调查为基础。

毫无疑问,自从1978年国家正式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经历着迅猛而彻底的改变,中国经济一直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08年时,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尝试和学习的过程,中国在这30年走过的决不是一条线性捷径。因此,改革时期的每一个年代都各有特色,对中国社会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我认为,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是尤其富有活力和弹性的重要十年。

在宏观层面上,改革时期的第一个十年里,党-国家和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都一样)都努力通过许多重要的制度变迁摆脱激进政治的影响。这些制度变迁包括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去集体化,到80年代后期许多大胆却并不一定成功的城市改革。在社会变革的许多方面,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其中之一是1989年以后党-国家和精英反而更坚决地告别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权力还保持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官方接受市场经济和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好例证。

从市场转型的角度看,下列因素表明90年代可能是最开放的十年: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所侵蚀,生活机会的新结构以及促使亿万中国人迁移的流动渠道的开放。因此,到了新世纪之交,具有魔力的“改革”一词开始在操作层面具

有不同的含义。新世纪的改革已经不再以改变过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事实上，它往往意味着经济资本持有者和政治掌权者的协商和论战而导致的政策调整。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指出，在改革时期的第三个十年，改革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参见 Sun 2004）。取而代之的是脱缰野马般的市场经济生产力和强势国家权力的联盟；它们的联手创造了 GDP 增长的奇迹、国家财政收入和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与此同时，还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的新困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目前，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并且针对这些负面后果进行各种政策调整。但是，90 年代界定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被迅速改变。

本书探讨的不是中国在 90 年代成功迈向市场经济的历程，而是从一个不同却同等重要的角度——从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应对制度变迁的视角和经历——来考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在整个 90 年代，每一次回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我都会真切地感到农村和城市居民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活力和适应力，以及从困惑、幻灭、鼓舞、希望、兴奋到实际行动的各种表现。虽然我很难充分解释我的所有观察，但我确认中国社会在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中正经历着结构性变迁。在一篇文章里，我用“迁徙”、“再定位”、“再分层”等术语从个体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描述这些变化是如何出现的。我还注意到这一变迁过程的核心是出现了一个“中国梦”的概念——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智慧和辛勤劳动改变其命运

的信念。我还观察到“自力更生”的含义已经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标语变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竞争中的个人主义的口号（详见 Yan 1994）。然而，那时我还不能看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正在我眼前展开。

我的顿悟发生在 2007 年。当我参照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理论（Giddens 1991；Bauman 2001；Beck 1992；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尤其是个体化命题——去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模式和趋势时，一切都豁然开朗。我发现，虽然中国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展现出第二现代性时代的许多个体化特征以及在西方应当属于现代时期甚至前现代时期的其他特点。作为一个扎根于田野的人类学工作者，我长期关注个体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快速变化：他们越来越要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自从 1989 年进行第一次田野工作后，我有幸利用各种机会记录个体村民和城市居民如何思考与行动，如何与各种制度变迁互动。然而，只有当我 2007 年回顾这些田野材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工作揭示了，由于改革时代制度变迁的结果，个体在中国迅速地崛起（有关中国个体最新的值得关注的研究，参见 Hansen and Svarverud 2010）。虽然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崛起是拙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心论点之一，但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在社会层面的重要含义，也就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本章将回顾我的研究在个体的崛起方面的主要发现；我还会利用新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以下十章的内容做些补充。贯穿本书的